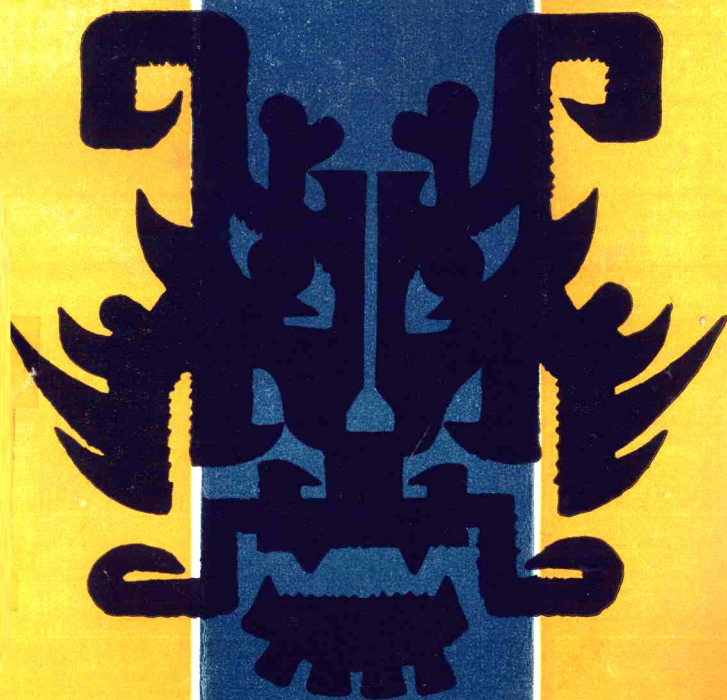


苗侗文坛

MIAODONG WENTAN

94 / 3



苗侗文壇 3/1994

1988年6月創刊 總第23期

-
- 论苗族与楚国
..... 石宗仁 (3)
- 略论黔南苗族支系的迁徙来源及分布
..... 苗族 吴正彪 (15)
- 也谈天王菩萨的族属
..... 苗族 吴正光 (30)
- 浅议湘南苗族油茶的渊源和功用
..... 苗族 杨胜科 (36)
- 苗鼓小议
..... 苗族 杨芳明 (41)
-
- 侗、侗戏、侗文化
..... 度修明 (43)
- 土家族“还侗愿”与演“三女”戏的渊源
..... 杨昌鑫 (56)
-

侗族民间故事简述

..... 侗族 龙玉成(78)

《湘西苗族民间文学概要》评介

..... 苗族 李炳泽(86)

浅谈云南文山州苗族音乐创作的艺术成就

..... 苗族 侯 健(88)

论苗族文学巨星沈从文

..... 王秀盈(98)

侗族“月亮文化”的语言诠释

——评张泽忠小说集《山乡笔记》

..... 廖开顺 石佳能(112)

论《风满木楼》的艺术视角和美学特征

..... 侗族 杨胜辉(123)

封面设计

..... 石俊生

论苗族与楚国

石宗仁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古代文明是由境内的各民族所共同创造。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黄河的中原华夏文化和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长江中下游蛮夷的楚文化,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精华,并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我国南方,北方和东部沿海已发掘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类型的分布状况,考古学界、史学界在八十年代初发表了“关于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发祥地的新看法”的文章,认为:长江中下游与黄河中上游同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长江中下游的自然条件远比黄河中上游更适宜于古代人类的繁衍生息。所以说,我国古代文明是三大集团即黄河中上游的华夏集团、长江中下游的苗蛮集团和东部沿海的东夷集团所共同创造。苗蛮集团的主要活动地在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区。之后,《湖北省楚史研究会召开 1984 年年会》综述中亦认为,我国“南方属于蛮夷文化体系”,^①楚文化最新研究成果之一《楚文化志》也认为:“湘西楚墓的大量发现,可证楚人早就进入湘西,有些可能是从郢都江陵直接进去的。”^②这些科学的论述,

都是以地下发场的材料为依据的。以上史学界、考古学界与楚学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苗族和楚国的关系以及楚国的族属,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本文、拟分几个问题加以论述。

一、有关先楚三苗的历史文献及其土著区位与荆楚的关系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楚国族属的研究,有过许多的论争。现在回顾一下,这些论争表现为一些研究,常常从“楚辞”或汉史文化单一视角的切入探讨楚的族属,不仅忽视了楚国中心区域有关土著人们共同体客观存在的历史文献,而且还忽略了考古学界、史学界、民族学界有关楚的族属的研究成果。这就使得我们的一些研究,如楚为“北来说”、“西来说”、“东来说”的论点,均很难令人信服或者说很难成立。然而也应看到,尤其以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著名的民族学家江应梁与马长寿、著名的人类学教授梁剑韬、陈户新、杨鹤书等学者关于楚的族属为土著苗族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

我们知道,先楚时,中国还没有成为统一的国家,即使到战国七雄时期,中国依然是处在多中心的邦域方国文化的发展阶段。当时中国的南方与北方,民族分布不同。从历史文献加以考察,我国黄河南域以南至长江中游地区,为土著苗族先民所居住。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颛顼生驩兜,驩兜生苗民。”《帝王世纪》云:“帝陶唐氏……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吕氏春秋·恃君览》载:“尧战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史记·五帝本纪》又载: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郭璞《山海经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史记·吴起列传》:“昔三苗氏左洞庭、

右彭蠡”。再如《路史·国名记》载：“周景武云：柴桑彭泽之间古三苗国”。《今本竹书纪年》曰：“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韩非子》载：“三苗之不服者……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战国策·魏略》：“禹伐三苗，东夷之兵不起。”《尚书地理今释》：“三苗今湖广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也。”等等。可见苗族先民三苗是黄河南域以南长江中游地区的土著。对此，《中外地名大辞典》更为详尽指出：“苗族……本是我国内地最古之土著，自黄帝战胜蚩尤于涿鹿，其种退居黄河以南。陶唐之世，苗民逆命，尧征而克于丹水之南，则又驱诸江汉之间。舜征三苗于三危……然其余种保居江南，左彭蠡而右洞庭，恃险以抗中国……周宣命召虎平荆蛮，春秋之世，楚起山林。”^③以上文献记载了先楚三苗的活动区位，并指明了三苗是黄河南域与长江中游的土著居民，夏人的聚居区则是远离此区的北方。

关于先楚三苗与荆楚的关系，考古学家郑杰祥在《屈家岭文化渊源试探》中指出：“……屈家岭文化应属于古代哪个部族的文化呢？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我们认为它应属于古老的先楚部族也即三苗部族的文化遗存，或者是这个古老部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楚部族，先秦文献又称荆或称楚。”“这个三苗就是后来称作荆楚的部族。”^④以上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学研究，均证明苗族先民三苗及其后裔荆蛮，是世居黄河南域的长江中游土著，荆蛮是三苗之后，二者与楚国的建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民族学材料证明,南方楚人的族称、自我民族意识及其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心理,同北方夏人有着根本的区别,二者是古代中国南北两个不同的族系。

我们知道,一个一定的历史国家的族属与该国家一定历史的人们共同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一个人们共同体的族系,离不开它的族称,民族自我意识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心理等人文要素。这些要素亦是认知古代农业文明民族的依据。历史上的政治家、语言学家、史学家、民族学家们,在谈到民族时,总是离不开上述关于塑构成民族的诸要素。关于这一点,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杨坤方生、根据斯大林关于构成民族的四个要素并结合我国的历史实际指出:“我认为四个要素还应增加一个,或说还有第五个要素,即民族的共同名称。各民族都有共同名称,没有共同名称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这五个特征中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共同语言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可能丧失,但民族意识,即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名称这两个要素总是不能丧失的。否则,这一民族就不存在了。”^⑤可见,楚人的民族族称、民族自我意识及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心理,是确认楚人族属的重要因素。然而,对楚国族属持北来说、东来说、西来说的一些研究与论点,不仅忽略了楚人的上述人文要素,而且游离于楚人的民族学材料之外,因而,三者对楚人族属的结论难以成立。那时候,中国的南北民族分布不同,南北的语言、民族族称、民族自我意识、经济生活、文化心理,均存在着民族性的差别。于下,拟在有关楚的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研究构成的当时南北民族分布的框架,对楚人的族属进行民族学、历史文献学与考古学的综合思考:

1、先谈楚人的族称与民族自我意识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它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

无论古代民族或近现代民族，作为民族的客观存在，均应具有自己当时当地的族称和民族意识以及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心理等要素。如果离开这些要素，就无法言清楚族的族属。楚人是否具备上述诸要素呢？我们从楚人的民族材料可以得到证实。

在有关楚的族属的汉文献里，楚人屡言“我蛮夷也。”如《史记·楚世家》：“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隋，隋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楚要屡说自己是蛮夷，理直气壮地表明“不与中国之号谥”，表示楚人荆蛮与华夏中国既不同族称、不同族类，亦不同国号。这已充分说明“我蛮夷”是楚人荆蛮自称——是一种非华夏的民族自称，并强烈而直裸地表现出楚人的蛮夷族自我意识与蛮夷族心理。很难设想，在建立人民共和国之前的充满民族压迫民族征讨民族歧视的古代中国，处于领先地位与拓展态势的中原夏人、王朝的统治者，会说自己是不不断被征讨向南溃退的蛮夷族与否认自己是强盛的夏人，这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在旧中国剥削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历史上，被征讨溃逃与被征服的弱小民族，为了生存，倒不乏其子民改族换姓，从属于讨伐胜利的强大的汉民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数以百万计的南北少数民族男女，从汉族回归少数民族，恢复其少数民族成份，正是旧中国大民族压迫历史的佐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楚子来告”、“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田”等文献表明，那是中原夏人王朝无力对中国南方实行

统治，好只让楚人熊绎去治理楚人的楚国。楚人一再向中原夏人屡说自己“我蛮夷也”，即反复表明“楚人不是夏人”的民族意识。蛮夷族此种与夏人泾渭分明的族称与民族自我意识，是古代中国民族压迫历史的造就：即“自黄帝战蚩首领蚩尤于涿鹿、尧伐驩兜于丹水之浦、舜窜三苗于三危”与“征荆蛮”、“伐荆楚”的历史过程中，蛮夷族不断被征讨不断南退，形成了蛮夷族抗拒夏人的民族意识与民族隔阂心理。所以，楚人“不与中国之号谥”、“故不与盟”，屡屡说自己是蛮夷。从民族学常识看来，楚人屡屡对夏人说自己是蛮夷，说明楚人已高高地举起一面有别于夏人的鲜明的民族“旗帜”——族称，而夏人称蛮夷为荆蛮（他称）便是对蛮夷族客观存在的确认。楚人自称蛮夷，他称荆蛮（或楚蛮）均已完备。历史上的北方夏人“战蚩尤”、“伐驩兜”、“窜三苗”、“平荆蛮”、“伐荆楚”长期对蛮夷族进行征讨的战争中，给蛮夷族带来了沉重的民族灾难，因而不断激发了蛮夷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及与夏人不同族类不同国号的心理。事实上，“战蚩尤”、“伐驩兜”、“窜三苗”、“平荆蛮”、“伐荆楚”是北夏的王朝长期对蛮夷族进行民族战争，造成两个位于南北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冲突，怎能说楚人蛮夷是夏人的南支呢？直到二十世纪的民国年间，仍然认为只有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苗族是汉族的一支，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2、楚人的语言与夏人亦是不同的

关于楚国的语言，笔者另有文章专论。在此，仅简要说明楚语与夏语是不同的民族语言。如刘先枚先生在《简论楚国语言》一文中说：“……北部中国与荆楚的语言大相径庭。所以称当时的楚国语言为《楚言》，楚国的音乐为《南音》（《吕氏春秋·音初》亦见《左传·成·九》），孟子对由楚之滕的许行，说他

是‘南蛮𪚩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什么叫𪚩舌？……意思是说他的语言难懂，简直象鸟鸣鹤噪一样。^⑧可见“楚为南蛮𪚩舌之人”，表明南楚与北夏即不同国号不同族类，而且还不同语种。关于“楚为南蛮𪚩舌之人”的南蛮，《中国民族史》认为：古称三苗为南蛮而在荆楚，楚亦自称蛮夷，则三苗必为楚也。由此可知，北夏人听不懂的“南蛮𪚩舌之人”的语言，是属于三苗的语言。

3、北夏与南楚的经济生活与文化心理亦是不同的

显然，黄河中原的北夏是旱地农牧经济；而南楚长江中游地区是水田稻作鱼猪经济。由于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与经济生活的差别，带来北夏南楚文化仰心理的根本不同。如北夏重礼制重理性；南楚则重巫风与人神同位，重感性，并富于浪漫色彩的幻想。

以上种种民族学材料证明，南楚蛮夷与北夏，是位于中国南北两个不同语言的平行发展的民族，两者之间有着长期的民族冲突。楚人蛮夷不是夏人的南支，而是楚地长江中游的土著。

三、汉文献记载“楚为荆蛮”之国而非北夏之邦

前已述及，在一些有关楚国族属的研究中，如北来说、东来说、西来说均忽略了历史文献对楚国族属与土著有关的历史记载。如《国语·晋语八》明言“楚为荆蛮”即是一例。这已明确无误地说楚是荆蛮之国。此外，还有许多有关楚国族属的历史文献，亦未被上述三说所重视。如《吕氏春秋·季夏记》在记述昭王南征时说：“周昭王将亲征荆蛮”。此荆蛮即指荆楚国

的土著蛮夷。《国语·晋语》载：“楚为荆蛮，置茆蕪，设望表，故不与盟。”道出了楚国是荆蛮（自称蛮夷）人建立的国家，不是夏人之国。《史记·楚世家》载：“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表明楚人与北夏即不同族类亦不同国号。夏人称南楚的蛮夷族为荆蛮（或楚蛮）则具体指明此蛮夷是荆国之蛮夷。“蛮”者至今仍是苗族的族称，蛮苗音转。当时用蛮不用曼，从字义上看，不免有几分夏人对楚人的轻蔑：蛮者只不过是会说话会缁丝的虫而已。这与历代王朝的戏舞台上，少数民族人物出场时，在其服饰背后必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加以蔑视相类似，这都是出自于不断向外拓展并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夏民族意识所致。

历史文献不仅记载“楚为荆”即楚为荆蛮人的国家，而且还直接记载并否定“楚为夏族”之说，如《佐传选》载：“楚虽大，非吾族也”^⑦表明楚虽人多地广，但不是夏人的。

汉文献还明确记载楚是蛮夷的国家，不是夏人之国。如《公羊传·僖公二十年》宋公子曰夷说：“楚，夷国也。”夷者即蛮夷的省称，蛮夷者即荆蛮也。蛮夷——苗。以上历史文献已明确指明楚是夷国不是夏国、楚虽大非夏族、楚是自称蛮夷的荆蛮建立的国家。

四、多学科材料证明，荆蛮与三苗和苗族是同一人们共同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

一个民族在其历史长河中，并不都是一个族称贯穿其历史进程，常常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在其不同历史阶段，使用不同的称谓，这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看来，乃为常事。汉族在秦汉以前称为夏人、周人等等。汉以后称为汉。其他民族亦类似的

情况。如苗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被称为三苗、荆蛮和苗族。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三者的关系。

我们知道，荆、楚是对荆楚的省称。荆蛮即荆地之蛮夷，楚蛮即楚地之蛮夷，二是同一，均指蛮夷族是荆楚国的土著民族。关于自称蛮夷的荆蛮属于任何族系的问题，前人曾有过许多的研究。如唐·李延寿《南史·南蛮传》说：“荆、雍州诸蛮，盘瓠之种也。”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辰，蛮夷所居也，其人皆盘瓠子孙。”辰即指古辰州，即今湘西自治州南部酉水流域以南至辰水流域、东至沅江两岸与西至黔川边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地区崇拜盘瓠的苗族，历史上被称为蛮夷，与荆、雍州崇拜盘瓠的蛮夷，同是盘瓠之后。

在《册府元龟》卷95《外臣部·国邑》又载：“荆蛮，盘瓠之后……长沙、黔中五溪蛮皆是也”。可见五溪蛮属于盘瓠之后的荆蛮，在此说的崇拜盘瓠的五溪蛮，显然是指苗族。《峒溪纤志》又云：“苗人，盘瓠之种也。”万历《湖广总兵·方輿一》：“诗称蛮荆，种自盘瓠”。蛮荆乃盘瓠之后。明·王夫之《楚辞通释》：屈原《涉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南夷’即武陵西南蛮夷，今辰沅之苗种也。”武陵西南蛮夷，系指今湘西州南部苗族聚居区和辰州地区与沅水上游五溪地区的苗族。以上历史文献表明，荆蛮、蛮荆、五溪蛮、南夷、苗人均为盘瓠之后的同一族体的不同称谓，这些盘瓠之后的荆蛮、南夷、苗人，即辰州与沅水一带的苗族。由此可知，五溪地区崇拜盘瓠的苗族与楚国荆蛮同一族类，湘西五溪的苗族是历史上荆蛮的一部分。可见苗族是荆蛮的后裔。

关于三苗与荆蛮的关系及荆蛮也居楚地问题，《古三苗疆域考》指出：“春秋时荆山三苗尚盛，故常连称荆蛮。”^⑧张雄教

授在《中国中南民族史》一书中指出：“先秦时，在原来‘三苗’活动的地域，分布着两大族群：‘荆蛮’居于楚地，‘杨越’居于楚以南的广大地区。随着楚的南侵，‘杨越’从长江以南逐渐退到岭南，‘荆蛮’则仍在长江中游一带活动。”⑩《中国民族史》对三苗、南蛮（蛮夷）、荆楚的关系指出：古“称三苗为南蛮而在荆楚，楚亦自称我蛮夷，则三苗必为楚也”。而地下考古材料研究亦认为：“屈家岭文化是三苗部族的文化遗存或者说是三苗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个三苗就是后来称作荆楚的部族。”⑪

从以上诸多文献记载与前人的研究可知，先楚三苗之后为荆蛮，荆蛮之后为苗族，三苗、荆蛮、苗族是崇拜盘瓠的同一族体不同时期的称谓。显然“楚为荆蛮”是正确的，荆蛮即苗族。

关于苗族与楚国的关系，现当代研究家们则有更多的论述。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中指出：“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范先生直接指明荆楚是三苗建立的国家。著名的民族学家江应梁先生在《苗人来源及其迁徙区域》中亦指出：“是楚之初，本为苗民，已无疑义。”“而楚自己也自称蛮夷”。“惟在楚沿江东下之先，已有若干苗人部落东来散居长江沿岸。《诗·殷武》：‘挾彼殷武，奋发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后；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汝荆楚，居国南方。’《诗·采芣》：‘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征伐玁狁，蛮荆来威。’这些蛮荆，都是先楚移居长江中下流的苗族部落”⑫江先生从民族学、民族史的视角，认为蛮荆即苗民，楚是苗民建立的国家。另一位民族学家马长涛在《苗瑶之起源神话》中亦认为：“楚疆之民，除少数汉族，大部分

为苗蛮土著。”^⑫

今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著名的人类学家梁剑韬、陈启新、杨鹤书等教授对于苗族与楚国的关系，则论证更为详尽，在其著《中国民族学概论》一书中指出：自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湖北、安徽、江西境内的苗族）建立楚国之后，苗族继续与中原人民自然同化，并创造了灿烂的楚国文化，其中较为落后的部落，在秦汉以后，迁于洞庭湖西岸，以常德为中心，沿五条溪水：辰、酉、巫、武、沅而居。”^⑬这不仅指明了楚国是苗族建立的国家，而且，还指出当今五溪地区的苗族（即湖南西部的苗族），还是楚人自秦汉以后移居五溪地区的遗民。这与《楚文化志》（430页）“关于楚墓分区问题的研究”中认为：“湘西楚墓的大量发现，可证楚人早就进入湘西，有些可能是从郢都江陵直接进去的”相一致。

上述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民族学材料和考古材料研究证明，以及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对苗族与楚国的关系的研究，均一致认为三苗、荆蛮、苗族是同一族体的不同时期，楚国是苗族建立的国家。而流传在湘黔川鄂边区苗族民间的史诗《中国苗族古歌》，是在苗族椎牛祭典会上，苗族宗教祭司屡屡要向与会的数以千计的苗民，述说当今东部方言（湘黔川鄂边区）的苗族，曾在吉楚（即荆楚的异译）大地开发祖国、创造牛耕稻作文明的情景、即苗绘了苗族在迁入湘西之前，曾在吉那（即纪南的异译）地方即今江汉平原水田之乡过着美好的生活，还在“迁徙歌”中，时时告诫子孙（湘黔川鄂边区的苗族），当今的苗族古时是从吉吴（即荆湖的异译）、吉不（即矾埔、圻埔、矾浦、吉埠等地的异译，均在长江中游水多平原）迁来。吉吴（荆湖），苗语意为宽广的水乡，吉不（矾浦等）意为水多宽广

的陆地。苗族“迁徙歌”^⑭述说苗族从吉楚(荆楚)、吉吴(荆湖)迁入湘西,与历史文献记载及考古材料证明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得知:三苗之后为荆蛮,荆蛮之后为苗族,三者均为盘瓠之后、是同一的苗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所以说,楚国是苗族建立的国家应是顺理成章的结论。

注:

①《江汉论坛》1994年12期《湖北楚史研究会召开1994年年会》一文。

②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第430页。

③《中外地名大辞典》(四)、人文出版社印行,第2604、2605页。

④⑩《楚文化研究论文集》:《屈家岭文化渊源试探》一文,河南考古学会编,中州出版社出版。

⑤《民族研究》1986年4月《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

⑥《楚文化新探》一书,湖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

⑦《左传选》22页,中华书局,1979年第3版。

⑧铖穆:《古三苗疆域考》民国《燕京学报》12期,1932年12月。

⑨张雄:《中国中南民族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

⑪江应梁:《苗人来源及其迁徙区域》连载于1940年《边政公论》第4、4期,被收入《西南边疆民族论丛》。

⑫马长涛:《苗瑶之起源神话》刊于民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2期。

⑬梁剑韬等:《中国民族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责任编辑 扬 鬃〕

略论黔南苗族支系的迁徙来源及分布

苗族

吴正彪

苗族是贵州南部地区的主体民族之一。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苗族就有 396591 人(1990 年统计数)，占全州总人口 3287565 人的 12.606%，而且在全州的十二个县(市)中均有苗族居住，其中人口最多的是惠水县，共有 77697 人，人口最少的是荔波县，只有 6413 人。从苗族分布的行政区域看，一个县内不仅同时有不同方言的苗族居住，即使是同一方言甚至是同土语区的苗族，其支系在风俗、语言及区域文化上也略有一定的差异。

黔南苗族有 $mə^{33}$ 、 $a^{55}mjo^{31}$ 、 g^{33} 、 $anəu^{13}$ 、 $mhoŋ^{24}$ 、 $moŋ^{11}zoŋ^{55}$ 、 $muŋ^{13}$ 、 po^{31} 、 $ga^{22}mao^{13}$ 、 $mhoŋ^{43}$ 等 20 多个支系。按方言划分，则有：(一)黔东方言(中部方言)苗族；(二)川黔滇方言(西部方言)苗族；(三)湘西方言(东部方言)苗族。调查、了解这些苗族支系的来源及分布情况，对我们进一步探讨苗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社会意义。

(一)

操黔东南方言的苗族，在黔东南分南、北两个土语，有五种服饰，十一多万人，约占全州苗族总人口的28%。主要分布在都匀的坝固、羊列、明英、桃花、新场、王司、基场、阳河；三都县的都江、打鱼、三合、苗龙、交梨、高硐、阳基、总奖；荔波县的水维、岜鲜；独山县的翁台；福泉县的陆坪、地松、翁阳、萱花、葛洞、凤山；瓮安县的草塘、金竹、桃子冲、老坟嘴等地。

黔东南方言苗族中，较早迁入黔东南而且现仍有居住的是都匀、三都交界一带及都匀城郊的部分吴氏苗族。据传，这支苗族是从江西朱氏巷白米街迁来，途经湖南进入广西，然后从贵州省独山县迁入都匀的。“肇”的儿子“匀”及孙子“都”便是这块荒地的最早开垦者，而“都匀”名称的来源，则是苗族父子连名制遗俗的产物。从如今仍健在的五十岁以上的人的苗名按父子连名制直推到“肇”公一代为止，现已有二十五代人，若以二十五年为一代计，这支苗族在都匀已有六百年左右的历史，由此推测，他们早在元末明初就已经在都匀定居。有关都匀的由来，据《都匀县志稿》云：“晋唐间名都匀，以县东二里有都匀洞峙山腰故也”。其年代与现存的父子连名制所推出来的年代有一定差距，但在当地苗族中却有一些关于都匀洞与苗族洞葬习俗改革的民间传说。由是观之，都匀的形成与这里的世居苗族存在有较为深远的渊源关系。

三都县交梨、高硐、苗龙、三合、普安、甲种、阳基以及都匀市的基场等地苗族大都是从黔东南州的榕江和从江迁入黔东南的。据三都县苗族的迁徙史诗《迁村移寨》Neexfangb jeet